

互物性和跨身體性

鮑爾斯《獲利》的政治生態學*

蔡振興**

摘要

美國小說家鮑爾斯(Richard Powers)在《獲利》(*Gain*)一書追溯萊斯伍(Lacewood)這個小鎮的崛起，而且小說也透過「遠近透視法」對蘿菈(Laura Brodey)在花園工作、家庭以及離不開克萊兒國際公司(Clare International)的「田園」生活作深描，直到蘿菈罹癌，田園生活嘎然而止。小說發展分為兩條主線：一是克萊兒國際公司如何在這個小鎮發跡以及該公司在開發的過程中有汙染環境的案例發生，另一是蘿菈的日常生活和物件之間的關係。從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角度來看，鮑爾斯的小說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從未「叩問物件」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對拉圖爾而言，行動者或行動體(actors/actants)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並非兩條平行線，毫無相交或重疊之處；原先被視為「理所當然」(matter of fact)其實是關心重點(matter of concern)和照顧重點(matter of care)。本文嘗試結合拉圖爾的物件理論和阿萊莫(Stacy Alaimo)的「跨身體性」(transcorporeality)來檢視克萊兒國際公司、蘿菈和毒物三者是如何形成「互物性」(interobjectivity)。透過拉圖爾的政治

* 本文105年7月19日收件；106年1月20日審查通過。

**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生態學，本文重審鮑爾斯小說筆下的資本主義所製造的毒物是如何透過「慢性暴力」的方式，悄然侵入身體和環境中。

關鍵詞：鮑爾斯，《獲利》，跨身體性，互物性，拉圖爾，政治生態學，毒物論述

Interobjectivity and Transcorporeality

Political Ecology in Richard Powers's *Gain*

Robin Chen-Hsing Tsai*

Abstract

In Richard Powers's *Gain*, the small town of Lacewood abruptly rises up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e author uses a far-and-near perspective to sketch the rural life of Laura Brodey working in her garden, her home and as well the ever present “garden” of Clare International up until the point that Laura suddenly contracts cancer. The narrative develops along two important lines: one is the rise of Claire an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ne ca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at happens; the secon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ily life of Laura and the objects she comes in contact with. For this study, the main issue of the story is “What role do the objects we have never inquired into play?” Latour holds that the actors/actants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not two parallel lines. He also says that what originally was considered “a matter of fact” is actually a “matter of concern” and then a “matter of care.” This paper combines Latour's object theory and Stacy Alaimo's theory of transcorporeality so that the reader can reread Powers's novel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oxicants produced by capitalism that utilizes slow violence to cunningly invade the body and the environment.

Keywords: Richard Powers, *Gain*, transcorporeality, interobjectivity, Bruno Latour, political ecology, object theory

*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mkang University.

airiti

互物性和跨身體性

鮑爾斯《獲利》的政治生態學*

蔡振興

有關「物」、「物件」和「物質」的論述，比較有系統的分析主要源自2007年4月17日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College)所舉辦的「思辯現實主義」(Speculative Realism)國際會議。¹ 這個會議的主要講員包括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哈門(Graham Harman)、布雷希耶(Ray Brassier)和格蘭特(Iain H. Grant)等。這些學者以「思辯現實主義」(speculative realism)為題，嘗試從不同的視角來探索物的形上學或本體論，並思考如何走出康德(Immanuel Kant)「物自身」(thing-in-itself)為「不可知」的命題，進而發展出客體／物件／物質理論或「物件導向哲學」(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簡稱“OOP”)，² 讓「物」或「非人」的角色、功能、關係和物件意義的探索能開展出新的向度。綜觀來說，這些相關領域學者所開拓出來的研究路徑有：（一）新物質主義：德勒茲(Gilles

* 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諸多建議，本人於修定過程中獲益良多，在此特別致上謝意。

1 有關會議的討論內容，詳見 *Collap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 (2007): 307-449。

2 在此，我想說明若干詞彙的來源：「思辯現實主義」(speculative realism)是布雷希耶(Ray Brassier)的想法，見《解放的虛無》(*Nihil Unbound: Enlightenment and Extinction*)：“Against the correlationist privileging of transcendental temporality, speculative (post-metaphysical) realism must uphold the autonomy of a space-time that is independent of the correlation of thinking and being. . .” (31, 149)；「物件導向哲學」(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則是哈門於1999年所提出的觀念；「物件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這個詞彙是由布萊恩在2009年率先使用；「思辯物質主義」(speculative materialism)一詞則出自《有限性之後》(*After Finitude*)，由梅亞蘇所提出的概念(38)。

Deleuze)及其追隨者,如德蘭達(Manuel DeLanda)、布蕾都蒂(Rosi Braidotti)、伯娜特(Jane Bennett),主張「物」有(生機論的)能動性;³(二)辯證物質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有別於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巴迪烏(Alain Badiou)和紀傑克(Slavoj Žižek)提出辯證物質主義,討論物的事件性;(三)思辯物質主義(speculative materialism):此一詞彙為梅亞蘇所創。相對於黑格爾(Hegel)的「思辯理想主義」(speculative idealism),梅亞蘇指出,長久以來客體的意義完全取決於主體,即人類中心的主客體共構主義(correlationism)知識論;因此,他提出「遠古性」(ancestrality)的概念來說明有些物件存在,例如「石油」,乃是先於人的感知或存在;(四)機器導向本體論(Machine-Oriented Ontology, MOO):布萊恩(Levi Bryant)嘗試走出主體/客體對立,將機器視為新時代的隱喻(metaphor),用來解釋機器(或科技物件,如手機)作為「媒介」角色;(五)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指出由主體主導客體的共構現象有將客體或物質被化約為被動的知識論課題/客體之嫌,成為「再現」的工具;也就是說,本來具有能動性的物/物質/物件/客體會從「關心重點」(matter of concern)的樣態被化約為一種「理所當然」(matter of fact)之疑慮;(六)物件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如哈門(Graham Harman)和莫頓(Timothy Morton)等;⁴(七)芭拉德(Karen Barad)的能動現實主義(Agential Realism);⁵(八)物的理論(Thing Theory):布朗(Bill Brown)認為以物為名可避免人本中心的知識論霸權;再者,物

3 詳見Rick Dolphijn和Iris van der Tuin的新物質主義研究入門專書*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 & Cartographies* (New York: Open Humanities P, 2012)。

4 哈門和莫頓認為人無法窮盡事物的本質,因為物件有「告退性」(withdrawal)。

5 所謂「能動現實主義」是一種物質女性主義批評,認為物質是一開始就是「關係」的表達,透過「能動性」(agency)的觀察,我們才能看到「權力」不均衡所導致的社會、文化和自然問題;為了走出二元對立的世界,芭拉德認為物質是一種「網內互動」(intra-action)的動態表達,彼此共伴、因此它結合知識論、本體論和倫理實踐(*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137-85)。

既是具體也是抽象，因此是一個矛盾的詞彙：「人越靠近它，它離人越遠」；因此，它有崇高之「物」(Das Ding)的弦外之音。⁶ 此外，夏丕柔(Stephen Shaviro)也指出「物」的重要。⁷ 對柯布魯克(Claire Colebrook)而言，思辯現實主義的學者體現兩種不同的表達形式：其一，「思辯」(speculation)將非人的「思想」從與「人」的共構關係中解放出來，讓思想本身也可以擁有自己的現實；其二，「物件」迫使「思考」走出人本中心論之外，本身能擁有自己的存在和價值；前者擁「思」，後者抱「物」(217-34)。儘管立場有異，這些學者均能提供生態文學批評的思考基石，不僅有助於重審人與非人之間的複雜關係，而且亦可幫助我們如何從物的角度出發，重新賦予物／物件／物質／客體內在的能動性和知識論，例如水、石油、汙染、臭氧層、大海嘯、大氣層、動物、植物和全球暖化現象等。換言之，這些(非人)物件都扮演某種角色。

在2009年〈非人是否能得到拯救〉(“Will Nonhumans Be Saved”)一文，拉圖爾為非人請命，反對達爾文(Charles Darwin)將「物質」視為「被動」的概念，因為物質可以「做工」(do the work)，帶出新的因果關係和角色扮演的潛勢(467-68)。⁸ 在〈社會轉向之後再一次轉向〉(“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 .”)，拉圖爾批評「人本中心論」是一種「真理中心論」(logocentrism)，因為這種思考模式可能製造人與非人之間的對立，讓物／客體／物質籠罩在人本中心論的「再現」世界之中。對拉圖爾而言，物件是過程，充滿蛻變的可能性，其意義溢出語言象徵之外；

6 詳見Bill Brown, “Thing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28.1 (2001) 11；另外可參考其專書 *Other Thing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15) 33。

7 詳見 *The Universe of Things: On Speculative Real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4)。

早先提出「思辯寫實主義」的布雷希耶(Ray Brassiere)後來也對這個運動和立場抱著懷疑的態度；參見“Philosophy Is Not Science’s Under-labourer”和“Postscript: Speculative Autopsy”，收錄於Peter Wolfendale,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The Noumenon’s New Clothes* (Winsor Quarry: Urbanomic Media, 2014) 409-21。

8 有關非人的研究，可進一步參考Deleuze and the Non/Human, ed. Jon Roffe and Hannah Sta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和Timothy Morton, *Hyperobjects* 22。

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將物件視為行動體，提供一條通往主／客、自然／社會對立之外的第三社會(the third estate)(Latour, *Politics of Nature* 54)。在《自然的政治》(*Politics of Nature*)一書中，拉圖爾提出「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的理念，作為因應生態危機所產生的相關議題，例如社會應如何改造？物件的意義如何重新定義？環境倫理應如何重新建構以及非人的角色應如何納入社會集體？與瓜達里(Félix Guattari)一樣，兩者並非環境末世論或危機理論倡導者，也不為自然辯護(Guattari 52)。拉圖爾甚至鼓勵我們「把自然放下」(to let go of nature)，走出自然作為「整體」、「和諧」的(深層)生態學幻覺，重新思考非人的議題(9, 25, 231)。在此，本文試圖以拉圖爾的「互物性」(interobjectivity)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來分析美國小說家鮑爾斯(Richard Powers)的小說《獲利》(*Gain*)，指出(有毒)物件的跨身體能動性。除了追溯萊斯伍(Lacewood)這個小鎮的崛起外，本文也分析小說如何透過「遠近透視法」讓蘿菈(Laura Brodey)的花園工作、家庭用品以及她的「田園」生活與克萊兒國際化學公司(Clare International)彼此產生密切關係。在小說中，儘管有物件被消音，但物件和物件的踪跡可透露「食物鏈」的方式，讓身體、有毒物件和彼此間的因果律關係，這就是拉圖爾所謂的「互物性」。這種互物性強調物也是社會的一環，不應被排除在外。對鮑爾斯而言，《獲利》描述個人、物件和歷史三者之間共伴的關係(*Interview* 104)。儘管如此，本書也嘗試「喚醒」人們了解大公司的履約承保無所不在(*Interview* 107)。換言之，作為行動體(actants)的克萊兒國際化學公司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並非兩條平行線；⁹ 相反地，兩者亦有相交或糾纏之處。原先

9 拉圖爾的「行動體」(actants)一詞來自葛雷瑪斯(A.-J. Greimas)，意指在敘述結構中，能幫助小說完成事件所代表的「功能性人物或角色」。在《法國巴氏殺菌法》(*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中，拉圖爾將這些角色推及至「非人」；例如，「海浪」也是一種行動體(158)。對拉圖爾來說，行動體和行為者(actors)意義近似，兩者的屬性或本質皆是流動的、蛻變的，但兩者的差別是：前者是抽象的，後者是具體的(“On Actor-Network Theory” 372-73; Blok and Jensen 48)。

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matter of fact)其實可能變成「關心重點」(matter of concern)。這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們從未「叩問物件」的意義。因此，拉圖爾的「行為者行動網路理論」有助於讀者瞭解「有毒物件」的潛能和蛻變的可能性。在《獲利》中，有毒物件就是「麻煩製造者」，它為蘿菈帶來身體病痛——癌症——的主要原因。在社會集體中，不只是人重要，非人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本論文也試圖結合女性物質主義批評家阿萊茉(Stacy Alaimo)的「跨身體性」(transcorporeality)理論，將克萊兒國際化學公司、蘿菈和毒物三者所形成的「互物性」(interobjectivity)的關係結構。換言之，物件會創造「事件」，提供我們重新審視人與非人之間的互涉關係，而拉圖爾的政治生態學可以重新開啟用物件理論來閱讀鮑爾斯小說筆下資本主義所製造的(毒)物如何透過尼克森(Rob Nixon)的「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的方式，悄然入侵身體和環境。

一、鮑爾斯的《獲利》

鮑爾斯是美國小說家，其小說《獲利》出版於1998年，故事將小說人物和歷史編織在一起，主要涵蓋兩條故事主線：一是蘿菈的日常生活和物件的貼身關係，另一是克萊兒國際公司發跡的歷史和商品在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汙染環境疑慮。這兩條故事就像「圓與切線」的關係，只在某點相交，然後各自走自己的路。換言之，克萊兒國際公司在萊斯伍鎮蓋工廠是事實，而且這也是兩者的「相交」之處：萊斯伍鎮的居民有了克萊兒國際公司之後，生活似乎越來越好，而克萊兒國際公司在此一小鎮的業務也能蒸蒸日上。至於其它方面，克萊兒國際公司和居民並沒有明顯的對話關係，如果克萊兒國際公司有問題，一切乃經由法律的管道解決。

小說一開始，克萊兒跨國公司就已經在萊斯伍鎮(Lacewood)選址、設廠並深耕地方。這主要是因克萊兒國際公司的老闆之一道格拉斯(Douglas)喜歡這裡原始的環境、便利的交通和便宜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克萊兒國際公司的工廠人力來源可以就地遴選，提供這個小鎮更多

的就業機會。於是，公司和當地居民形成一種「水幫魚，魚幫水」的回饋機制。對居民而言，幸虧有克萊兒國際公司，否則小鎮將會「永遠沉睡下去」(8)。此外，克萊兒國際公司也願意幫忙這個小鎮，適時地贊助與當地教育、新聞媒體和其他藝文活動相關的活動。日積月累，克萊兒這個品牌已經變成鎮民的「第二天性」(6)，舉凡洗髮精、抗酸劑、肥皂、肥料、化妝品或其它食物來源，幾乎都離不開克萊兒。克萊兒造「物」，也滿足人的「物」欲，讓人更像人。

女主角蘿菈在花園中除草，自己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克萊兒國際公司的廣告曲。儘管自己與克萊兒國際公司無直接關係。生活上，她對克萊兒國際公司的任何商品也沒有怨言。在小說中，蘿菈現年四十二歲，育有一男一女，男生叫提姆(Tim)，女生叫艾倫(Ellen)。蘿菈不喜歡詩歌，對日常生活也無特別期待。她是「下個世紀房地產公司」(Next Millennium Realty)的業務員。從小鎮的原始環境描述到蘿菈的花園除草工作，這種小說敘述策略給予讀者一種「與世隔絕」的烏托邦想像(*Understanding* 113)。

在小說中，蘿菈想幫助兒子做功課，設法詮釋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渡河過布魯克林橋〉(“Crossing Brooklyn Ferry”)。可惜的是，蘿菈並不喜歡這首詩，也無法參透這首詩(88)。與詩人惠特曼不一樣的是：惠特曼是一位浪漫主義詩人，他不斷探索事物的新意，在重複中見差異、在疏離中見普世友情、在自然中見到平等的真諦；相反地，蘿菈不愛改變現狀，只喜歡一成不變的生活(Life as usual)(85)。蘿菈曾參加一位年輕罹癌少女的葬禮，但沒想到她自己不久之後，也被診斷罹患卵巢癌，儘管經過痛苦的化療過程，病情曾一度好轉，最後她還是因癌症復發而過世。這種小說背景與卡蓀(Rachel Carson)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所描述的情境類似：在風和日麗的田園景色當中，敘述者透過「由遠而近」(far-and-near perspective)的鏡頭，處理蘿菈日常生活、得病、化療和過世。最後，小說中田園的、浪漫的、理想的生活終究成為一場夢，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瑞秋的女兒」(Rachel's daughter)。

其實，蘿菈的失望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物件和身體之間的關係。在論及鮑爾斯的小說《獲利》時，拉圖爾特別喜歡這本小說對「物」和「物質能動性」的描述。¹⁰ 蘿菈是唐(Don)的前妻，小唐四歲，兩人認識二十年，她不聰明，算數不好，數學也不好(39)。她認為健康是抽象的觀念，因此她對身體的狀況並不是很在乎(40)。當她被診斷有囊腫(cyst)，她也並非特別在意，而是對生活採取放任和宿命態度。儘管她現在有一個男朋友叫肯(Ken)，但真的有事發生時，她還是比較喜歡請前夫唐來幫忙。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上，蘿拉比較在乎商品的正面效果，至於商品是否會如何影響身體健康或汙染環境，她較不關注，也未培養與此一領域有相關的生態意識，甚至認為兩者之間並無對應關係。然而，在《生態疾病》(*Ecosickness in Contemporary U.S. Fiction*)，郝瑟(Heather Houser)將《獲利》一書中人與環境的糾葛視為一種「情動力」(affect)的關係(3)；也就是說，人與非人不僅能互動，也會互相影響，感染疾病。

小說的第二條線敘述克萊兒公司的歷史。對鮑爾斯和拉圖爾而言，克萊兒公司的歷史是科學研究的歷史。儘管這條敘述主線是由科學研究所佈署出來的，其本身的故事性也強。整體而言，克萊兒公司的歷史是物件的歷史、「獲利」的歷史和作為(非人)行動者的歷史。反諷的是，做為行動者，蘿菈因罹癌而逐漸失能。

克萊兒公司是由傑塔(Jephthah Clare)和莎菈(Sarah Clare)於1802年所建立的。剛開始的時候，克萊兒公司是零售商，販賣「瑋緻活」(Wedgewood)瓷器以及洗衣用品，後來也加賣咖啡、酒精、漁獲，包括鱈魚、飛魚和帽子等等。傑塔有四個小孩：老大山謬爾(Samuel)，老二雷卓(Resolve)，老三拉斐爾(Raphael)，老四班雅明(Benjamin)。早期克萊兒公司生意時好時壞，充滿風險。後來，公司進口「佩奇肥皂」(Pech's

10 在《重組社會》(*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中，拉圖爾提到鮑爾斯的《獲利》，但未對小說做相關文本分析(56)。

Soap)，利潤才開始慢慢增加。有趣的是，老二雷卓巧遇剛從愛爾蘭到波士頓來闖天下的安尼斯(Robert Ennis)。很不幸地，在旅途當中，安尼斯的太太在尚未踏上美國新大陸之前，就因水土不服而過世。為了在新大陸能夠存活，就在1830年的一個晚上，他開始做蠟燭(tallow candles)，也試著兜售蠟燭，並在偶然的機緣下，遇到雷卓。有生意頭腦的雷卓發現安尼斯的蠟燭或許可幫公司開闢財源，於是他向安尼斯訂購蠟燭販賣，而且兩人後來甚至合夥製造並銷售蠟燭。這不但讓安尼斯可以幫太太買墓地，而且克萊兒公司也可以販售屬於自家的蠟燭，公司生意終於漸入佳境。1835年，雷卓再請另一位工程師何威特(Anthony Hewitt)另蓋更大的工廠製造蠟燭，以增加市佔率(44)。

另外，老大山謬爾認識雜貨商福克斯家族，並與小他五歲的福克斯家族女兒杜卡斯(Dorcas)結婚。老二雷卓後來與茱莉亞結婚，克萊兒家族公司的雛形於焉形成。其中，茱莉亞負責會計，山謬爾負責財政事宜，雷卓則幫忙製造蠟燭。小兒子班雅明則是哈佛畢業生，偏好探險和從事研究，尤其是植物。1940年，富冒險精神的班雅明乘著《孔雀號》(The Peacock)探險南極，也到過斐濟群島和夏威夷群島等地。當他返回波士頓後，他忙著研發香皂，實驗各種商品的新味道，也幫忙公司產品拿到許可證明，讓公司產品能擁有迷人的香味。克萊兒的家族成員彼此合作，儼然成為克萊兒國際公司。最後，屬於克萊兒公司的自家肥皂終於成功上市。很不幸的是，1860年之後，雷卓過世。班雅民為了研發的新產品，也以自己的身體為實驗，讓身體暴露於毒物之中，最後於1865年過世。後來，公司新的接班人出現，包括彼得(Peter)、道格拉斯(Douglas)和威廉(William)等人(134)。儘管克萊兒國際肥皂公司一百五十年的發展史是歷史敘述，在剖析這些人物時，鮑爾斯非常精確地指出：班雅明是一位探險家；茱莉亞是一位擴張主義者；杜卡斯是一位宗教狂熱份子。

在訪談中鮑爾斯說，在早期著作中，他的故事的背後隱約藏有一種特殊主題：「那是生意、那是市場、那是公司」(Maliszewski 166)。批

評家馬歷傑斯基(Paul Maliszewski)認為,即便《獲利》當然也處理類似主題,但卻與早期小說不同(166)。用拉圖爾的話來說,《獲利》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獲利》的寫作目的不是在強調一個公司如何做生意,而是深描一個家族如何透過做生意變成一個公司的過程。在此,鮑爾斯匠心獨運之處在於將十九世紀的蠟燭業、肥皂業、工業化學、清潔劑、寶鹼公司(P&G)、個人護理用品、肥料等串聯起來,形成一種關係網絡。

二、從「物」到「悟」:拉圖爾的「關係社會學」

在物件導向本體論學者中,哈門和拉圖爾兩人既是親密戰友,也是敵人。哈門不喜歡拉圖爾的「關係」(relation)作為物件的方法論,並且批評他的物件理論缺乏「本質」的描述。事實上,兩人的方法論迥異:哈門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信徒;拉圖爾則是德勒茲的追隨者。即便如此,在〈拉圖爾對哲學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runo Latour for Philosophy”)文章中,哈門為拉圖爾撰文,指出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頗具啟發性(31)。¹¹ 拜哈門之所賜,拉圖爾的學術貢獻漸漸獲得較多的關注。晚近,在物件導向理論和新物質主義的第四波生態論述浪潮下,拉圖爾的物件理論才慢慢地重新被認識。¹²

拉圖爾師承賽爾(Michel Serres),也深受懷海德(A. N. Whitehead)的影響(Blok and Jensen 13-16)。綜合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等專長於一身,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將非人轉譯到新的社會集合體,改寫傳統

11 哈門在2007年寫了這篇介紹拉圖爾文章,之後他又撰寫兩本有關拉圖爾的專書:《網絡王子:拉圖爾與形上學》(*Prince of Networks: Bruno Latour and Metaphysics*, 2007)和《王子與狼》(*Prince and Wolf*, 2009)。

12 儘管如此,哈門和其它學者,包括布魯兒(David Bloor),林區(Michael Lynch),得密特(David Demeritt),華生(Matthew C. Watson),丟伯樂(Gunther Teubner)等學者,分別從形上學、系統理論、能動性、女性主義、建構論和法律等不同立場和觀點,質疑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學者對物／物件／客體的看法。為了探究物在新的社會集合體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質疑康德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為「不可知」的概念。¹³ 康德說：

空間中現象的先驗概念是一種批判性的提醒，亦即在空間中所直觀到的任何東西都不是物自身，而且空間也不是物自身固有的特質。我們完全不知道物自身，他們無非是我們感性的再現形式而已。若僅透過感性的再現，物自身不可知、不能知。其形式也從來不在經驗中被提出來探討。(康德40-41)

另外，康德也說：

我們的一切直觀無非是關於現象的再現：我們所直觀的事物不是物自身。我們既不是為了物自身而直觀這些事物，他們的關係也不是如同他們向我們所顯現出的自身一樣。如果我們把我們的主體，哪怕只要把一般感官的直觀性狀取消掉了的話，客體在空間和時間裡的一切性狀、一切關係，乃至於空間和時間本身，就都會消失，並且他們作為現象不能自在地實存，只能存在我們裡面。(康德50)

上述引文指出，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不存於現象界：「我們所直觀的事物不是物自身」，而是「現象的再現」。拉圖爾不同意康德的說法。他認為康德人本中心的再現理論會製造另一則「山洞寓言」(the allegory of the Cave)(10)，意即會將「物」視為「幻覺」。很明顯地，拉圖爾的政治生態學嘗試走出理念／現象、主體／客觀、文化／自然的對立世界。為了突顯「物」是可以理解的想法，拉圖爾援引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和比

13 對康德而言，「物」和「物自身」屬不同範疇，但拉圖爾在此硬將兩者作類比，有範疇混淆之錯誤。

較人類學(comparative anthropology)，說明兩者的結合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物」的意義，包括非人及其「告退」本質，並將「物(自身)」從「理所當然」或「黑盒子」的世界解放出來。因此，拉圖爾對康德的「物自身」做出兩點回應：

物自身。他們很好，非常謝謝你。你好嗎？依你見解，你抱怨諸多東西並未適當地被尊重。你覺得這些東西在你們的意識中缺乏靈感嗎？如果你在今天早上沒有看到斑馬在大草原中，自由地奔馳著，這樣對你是不好。但是，斑馬不會因為你不在那兒就感到抱歉。無論如何，你們會把這些斑馬馴服、殺死、然後照相或做研究。物自身不會匱乏。就如同非洲人在白人還沒有來之前，他們不缺白人。
(*Pasteurization* 193)

從具有爭議性的自然中解放非人，我們並不宣稱讓他們自命自度、無法捉摸、沒有意義、沒有資格，就好像他們佔據了物本身那種不討喜的位置。如果我們必須解放他們，我們要做得更完整一點，特別是從康德主義所剝奪掉並且詛咒他們與社會不再有聯結的路障中解放出來。社會世界不是僅由主體組成，正如自然不是僅由物件所組成的一樣。(*Politics of Nature* 51)

上述第一個引文中，拉圖爾第一個回應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對物件所持的立場一致：月球如果沒有人在看，它還是存在的(Mermin 38)。拉圖爾在第二個引文則承認，物件與物件之間的關係可以通過科學研究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去完成物件意義的描述。很明顯地，拉圖爾與愛因斯坦皆認為：一方面承認「物」的存在是獨立於「建構主義」的主客關係，另一方面也說明科學研究就可以讓物或物件有其(部份)可見性(Mermin 38-47)。同樣地，在《潘朵拉的希望》(*Pandora's Hope*)一書中，拉圖爾重申，物件若是脫離社會集合體，那麼物件充其

量也只不過是物件而已，「不可知，就像被埋在地下」(193)。物(質)乃是透過實踐過程中去創造意義，即「事物發生論」(pragmatogony)，其另類本質(*other entities*)才可經由「翻譯」傳達出來；科學研究就是「將非人加以社會化並與人產生聯結關係」的媒介(194)。這個論點與《重組社會》(*Reassembling the Social*)的前言相互呼應。在本書中，拉圖爾重新定義「社會」(the social)：社會這個字的字源為“seq-, sequi”，有「跟隨」(to follow)之意(6)。社會這個字的拉丁文為 *socius*，暗指「關係的尋覓」(the tracing of association)(5)；因此，它不是一種社會研究的「學科」；相反地，拉圖爾的社會指向尚未形成現代社會前的「一種聯結」(a type of connection)關係(5)。若是有異質性的東西被擺置在一起，彼此間就能形成新關係，其新意也將被翻譯出來。依拉圖爾的創意，所謂的「社會學」，其實它就是「關係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因此，社會學(sociology)就是關係學(associology)(9-10)。

在《物質能動性：邁向非人類中心的研究》(*Material Agency: Towards a Non-Anthropocentric Approach*)中，卡納沛(Carl Knappett)和馬拉福黎斯(Lambros Malafouris)兩位編者提出兩個有趣的修辭學問題：(1)提出物質和非人的能動性難道真的是一項錯誤嗎？(2)能動性只是人類特有的屬性嗎？(1)。這兩個問題反映出兩位編者的立場：過去，人本中心論的角度透過人的「意識」和「意向性」進行意義詮釋和再現的工作。一般社會學家泰半認為「歷史上，真正具有能動性特質是具體的個人」(qtd. in Knappett and Malafouris x)；同樣地，一般文化學者也認為「只有具能動性的人才能定義價值」。很明顯地，上述能動性的概念主要還是「人」的延伸，忽略「非人」。一反這些傳統的觀點，物件導向理論學者能賦予物件較大的自由，例如哈門、布萊恩和拉圖爾。在《自然的政治》中，拉圖爾認為自然和社會、人和物(件)同屬社會集體，彼此共在，並致力於未來的共同世界。¹⁴ 透過物件導向理論的分析，或許我們對物件的意義

14 在此，圖爾相信「民主政治」，反對「帝國政治」(*Politics of Nature* 88-89)。

可有新的體悟：在新的社會集體中，人與物(件)可產生新的連結，而且(毒)物亦可帶出新的倫理意涵，成為「關心重點」，尤其是物與身體所形成的互物性「毒物鏈」。

三、互物性、跨身體性和慢性暴力

鮑爾斯《獲利》的毒物鏈是人的身體和資本主義的物聯網共同交織而成的，兩者關係看似遙遠卻又親近。蘿菈罹癌的身體亦可用阿萊萊從「身體」(the body)出發的新物質主義(*Bodily Natures* 15；“Dispersing Disaster” 178-79)來分析毒物的效應。這不是要把鮑爾斯《獲利》道德化，將資本主義視為癌症，而是透過物件分析，讓人更了解人和非人的關係。在日常生活裡，蘿菈已經離不開物：「超乎想像之外，她每天每個時刻都依賴更多的公司商品」(304)。對阿萊萊而言，檢視(女)人的身體(及其物質性)如何與(非人的)自然環境產生關係的例子，可用來解釋物件本質、意義和物質力量所產生的(負面)能動性。如此一來，身體就不至於淪為無美學(in-aesthetic)、無政治(a-political)、無理論(a-theoretical)、無歷史(a-historical)、無生物性(a-biological)(*Bodily Natures* 3)。

阿萊萊的「跨身體性」(trans-corporeality)是新物質主義的表達形式(Alaimo, *Exposed* 112)。之所以如此說乃因為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過度重視「語言」而輕忽物質(性)之故。那麼，何謂「跨身體性」？跨身體性是從「身體」和「環境」互動開始的。身體不是「被動」的建構物，而是有其角色扮演和能動性。阿萊萊反對將身體納入括弧，存而不論。跨身體性追蹤兩者之間能量的交換過程，藉此打破穩定的、和諧的、封閉的界限／線(“States of Suspension” 477)。因此，(人與非人的)身體可與海洋、動物、植物或其他「超物件」(hyperobjects)，例如空氣汙染、全球暖化、油汙染或其他致癌物質，形成跨身體關係，即「身體自然」(bodily natures)。

在《身體自然》(*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一書中，阿萊萊指出，女性主義的物質轉向(身體研究)提供一種走出後結構主義「語言轉向」之後的研究方向。結合上述學者對物質的新看法，從被視為客觀且「理所當然」的身體過渡到具有物質能動性的身體，這種批判轉向能使身體在文化中所處的尷尬位置具有可見性，成為「關心重點」。語言可以幫助我們建構知識，但(身體)物質的條件才是讓「道」(words)成為可能。和拉圖爾一樣，阿萊萊同意「科學研究」觀念可重建「物質屬性、行為和物質能動性」的意義(8)。換言之，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可結合「現實性」(reality)、「敘述性」(narrativity)和「集體性」(collectivity)三大領域之問題(*Bodily Natures* 9)，認可「科學研究」對非人(the nonhuman)論述的貢獻。

阿萊萊的「跨身體性」是一種「介面」或一種「關係詩學」。作為新物質主義的方法論基礎，這種「跨身體性」試圖走出「人本中心論」和「人類例外主義」(human exceptionalism)(15)。然而，阿萊萊認為，人的身體並非「自給自足」；同樣地，我們所關心的(環境)物質有時也「非地域性」(nonlocal)。阿萊萊說：「儘管跨身體性作為一種人與環境之間的溝通有時是地域性的，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中，去追溯有毒物質的來源，常常透露出全球不義、鬆弛的法規和環境惡化的網絡結構」(15)。阿萊萊的跨身體性論述可以幫助我們檢驗人與物質世界的關係，包括「環境健康、環境正義、網路次文化、綠色消費、文學、攝影、行動主義網站和電影」等等(20)；很清楚地，人的身體和自然的身體彼此牽引、共伴(entanglements)和聯結。

或許，拉圖爾「行動者網絡理論」可以延伸解釋阿萊萊的「網絡結構」(networks)。在〈互物性〉(“On Interobjectivity”)一文中，拉圖爾一如往常，認為社會應包括非人的社會生命(“Do Scientific Objects” 79)。藉由猴子和狒狒的實驗，我們也可以發現人類之前的靈長類也有豐富的生活：他們合作、協商和互動，完成工作。在鮑爾斯的小說《獲利》中，互物性的例子不是來自「動物」，而是來自「毒物」。

對拉圖爾而言，互物性即互動性的表達。互動是雙向的，沒有預設

立場，只有關係作為網絡平台；因此，互動既是「框架」(framework)，也是「網絡」(network)。¹⁵ 互動的意義不只「調整」，它也「建構」意／異義(“On Interobjectivity” 230)的可能性。拉圖爾指出，傳統「人性，太人性」的封閉社會未能賦予物件相對的意義和價值，此將導致(社會)結構和(物質)能動性的對立。透過對動物和物件的互動分析，他試圖讓非人在新的「社會集體」有一席之地。拉圖爾宣稱，我們的社會過度強調「不在場」的象徵和象徵主義，反而會忽略「在場的」人與非人之間互動關係；因此，我們的「社會學沒有物件」(Sociology without an object) (234)。為彌補此一缺陷，拉圖爾認為，只給物件該有的重量是不夠的，我們仍須修正傳統「社會科學」對物件「去本體論化」的工程。不管是好是壞，物件都會以「作工」(Objects do *do* something)的形式進行溝通(236)。拉圖爾強調，人類為物件所環繞，這是不爭的社會事實。然而為了避免社會結構和物件之間的對立，他建議我們可以採用三種態度去因應：(一)物件的確有其社會性，因此不應被排除在外；(二)人與非人均是行為者，彼此屬性可以交流(an exchange of properties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actants)；(三)物件是流動的，既是地方也是全球，因此是非地域性的(“Interobjectivity” 238)。這些觀念是拉圖爾的內建想法，如同在〈從現實政治到物政治〉(“From Realpolitik to *Dingpolitik*”)所揭櫫的，他想創造一個具絕對民主特色的「物件共合國」(*Res publica*) (23)。

那麼，如何用跨身體性和互物性來解釋鮑爾斯的小說《獲利》？在小說中，蘿菈的「癌症」是黏人的(viscous)，會跟著蘿菈一輩子。像油田、塑膠袋、核子廢料、銻、鈾、保麗龍、全球暖化、資本主義和癌症等一樣，這些物件既巨大，又散佈在生活中的各個角落，既遠又近，若有似

15 巴拉德(Karen Barad)提出「網內互動」(“intra-action”)的概念，而拉圖爾在「行動者網絡理論」架構下，則使用「互動」(“interaction”)這個詞彙，使其「互動」概念也能有較具平等觀的網內互動意涵(826)。

無，難以擺脫，凡是具有這些特色均可稱為「超物件」。¹⁶ 由於具互物性的跨界特質，它也是一種「慢性暴力」的生命政治根源：

慢性暴力是指一種正在慢慢發生但卻又看不見的暴力，一種會在時空中擴散的延遲性毀滅暴力，一種根本不會讓人覺得是暴力的耗損性暴力。習慣上，暴力被視為是一種事件或行動。在時間上，它是立即性的；在空間上，它是爆發性且駭人驚聞的。同時，它的驚爆點可以馬上引發聳動的能見度。但是，現在我們需要處理一種不一樣的暴力，一種既不是聳動的，也不是馬上的，而是在時間的境域之中會顯現出來的一種不斷增強的、累積的、災難的暴力。這麼做，我們需要處理由慢性暴力所引發之相對不明顯的再現、故事和策略性挑戰。(2)¹⁷

誠如前面所言，《獲利》有兩條故事主線：蘿菈的生命書寫和克萊兒公司的發跡史。前者用「精讀」(close reading)的策略來描述蘿菈與(超)物件的關係，後者是用「遠讀」(distant reading)的方式進行有關克萊兒的歷史敘述(Moretti 47-49)。從遠讀的角度，克萊兒公司從1880年代開始進駐萊斯伍鎮，迄今已有百年。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克萊兒公司的歷史演變：不斷地研發產品，處理風險和危機，讓公司繼續存活下去。蘿菈使用克萊兒公司的產品近三十年，而且三十年如一日，從來沒有懷疑過產品有

-
- 16 生態學者莫頓(Timothy Morton)認為「超物件」包含五大特色：(1)黏人的(viscous)；(2)非定域性(nonlocal)；(3)時間振動(temporal undulation)；(4)階段性(phasing)；和(5)互物性(interobjectivity)(27-96)。
- 17 文化研究學者尼克森(Rob Nixon)在《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導言中暗批世界銀行總裁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建議要將第一世界富有國家的有毒垃圾，運往落後的非洲國家，這樣做可以讓環境主義者「眼不見為清」。尼克森把桑默斯的提議視為「慢性暴力」：第一世界的有錢人可以享受資本主義所提供的優渥生活，而第三世界的窮人就須忍受環境不義所帶來的慢性暴力，包括毒物和核廢料等。

問題。她沒有環境意識，始終相信其卵巢癌是遺傳的。然而前夫告訴她說，克萊兒公司所使用的殺蟲劑有「全反式維生素a酸」(Atra)的致癌成分，這時蘿菈才依唐的建議：「告他們，她想。他們要負起責任，分毫不能少。把他們公司拆成幾個部門」(320)。儘管有事證，蘿菈還是克萊兒公司的忠實客戶，認為「這家公司有沒有帶給她癌症沒有差別。他們已經給她所要的東西了。每個可想到的領域雖可剝奪她的生命，卻也同時形塑她的生命」(320)。就物件／商品而言，蘿菈「天生匱乏」(born wanting)，而克萊兒公司可以滿足她的需求，彌補她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她已與克萊兒合而為一：「她能哼著克萊兒的主題廣告歌而不自覺」(7)。

蘿菈主體性建構來自克萊兒的商品，而克萊兒的「商品」也和蘿菈的「身體」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形成跨身體性和互物性的關係：

地板用「抗菌」，窗戶用「亮晶晶」，桌子用「殖民風格」。她發誓要消費者抵制。春天要把這些東西全部清除掉。整個房間都是克萊兒的產品，報紙上、前夫唐、律師，每個人對克萊兒都不諒解。這好像是說，癌症會從窗戶闖進來。如果真的如此，那也是內鬼做的，需要有共犯打開門栓，讓它進來。是她自己選擇要買的，並且把這些商品裝入購物袋。如果還能再做選擇，她還是會再一次地做同樣的選擇。(303-04)

蘿菈的化療共做五次，整個過程對蘿菈身體的影響不在話下：掉頭髮、變了樣、嘔吐、噁心、失去健康等等。她感到被克萊兒出賣，甚至被「約會強暴」：「克萊兒進來帶她去吃飯和跳舞。他是一位體格健壯、心存善念、又帥又吸引人的中年男子，帶著一大束花、精心挑選的禮物加上一首詩，常來看她，總是發現她在家。總是跳舞的浪漫夜晚，直到夜深人靜和親吻。殘酷的一擊，約會強暴」(344)。由於化療之故，蘿菈發現自己的身體被資本主義的商品入侵，深感受傷。表面上，克萊兒很溫

柔，然而慢性暴力以症狀的形式悄然上身，讓物件、身體（蘿菈和克萊兒）、疾病和資本主義將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改寫為「行動者毒物網絡理論」。

四、《獲利》政治生態學

政治生態學是一種症狀閱讀，希冀處理自然、環境、非人和生態等議題，期能讓真正的民主能落實於現代議會之中。它反對將自然視為「合諧」、「先驗」和「整體」，也批評物件、食安、環境和動物等「非人」議題被視為「事實」或「理所當然」。就生命之網而言，行動體彼此之間能互動，產生聯結，製造不同的情動力。這也說明英國社會學家貝拉卡莎（Maria Puig de la Bellacasa）用「照顧之事」（matter of care）的觀念來補充拉圖爾前二者對物件倫理學論述不足之處（86）。從物件理論的角度來看，生態危機其實泛指「物的危機」：食安問題、毒奶粉事件、核廢料問題、全球暖化、臭氧層破洞、北極熊的滅絕、海平面上升和地層下陷等等。¹⁸ 在〈從現實政治到物政治〉中，拉圖爾看到這些「物的危機」，指出國家大事（matters）雖是議會殿堂討論的重點，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thing/matter）也可進入議會殿堂，成為社會集合體的一部分，受到充分討論，翻轉讀者一般約定俗成的認知，企圖建立「物件導向民主」的物件共合國。

物件與情動力有關，它會帶來情感的聯結或截斷。拉圖爾說，每個物件會編織自己的物聯網（15），為了賦予物件其政治性，物件導向民主批評現代議會（modern constitution）中「代議形式」太過強調「人」的政治，否定「物」的可能性條件。有鑒於此，拉圖爾適時補充物件理論，視「物」為「潛勢」（poetential），而不再是不可知之「物自身」，因為這樣的做法有失公允，會「對不起物、科學、物性和經驗」（19）。

18 懷特（Lynn White, Jr.）認為生態危機是基督教人本心論所帶來的危機（1205）；澳洲學者普蘭蕪（Val Plumwood）則認為生態危機是「理性的危機」（crisis of reason）（4）。

拉圖爾對「物」的理解受到海德格的啟發(Heidegger 174-79; Latour, “From Realpolitik to *Dingpolitik*” 22-26), 故而重新追溯「物」的字源學意義:「物」的原始意義為「集會」(assembly), 引申有「敲定案例」(to settle on a case)之意。物的希臘文為 *res*, 拉丁文為 *ens*。隨著語言的發展, 中世紀的「物」漸由原先的「動詞」變成「名詞」。例如, 神學家艾卡(Meiser Eckhart)把神視為「最崇高之物」(the “highest and uppermost thing”)。海德格重新探討物的本體論差異, 並恢復物與世界的關係: 物可以把「天、地、神、人」重新聯結在一起。因此, 海德格批評康德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根本是「無物」(no-thing)。對拉圖爾而言,「物與關係人及為何引起關心和分裂」串聯起來, 讓物具有政治能動性; 因此, 它也主張「回到事物本源」(“Back to Things”)。因此, 拉圖爾特別思考「怎麼做」(What is to be done?)的議題。

拉圖爾認為, 在邁向政治生態學的道路上有三個路障需要清除: (一)反對科學研究不受重視; (二)傳統自然觀須要放棄; (三)民主政治的觀念應納入非人(*Politics of Nature* 3-5)。在《自然政治》中, 拉圖爾重新審視科學研究、自然和政治的新方向, 活化「物的會議」所代表的意義; 如此一來, 我們才能重新思考主體和客體、事實和科學、人和非人。¹⁹ 因此, 政治生態學是一種新的「政治知識論」。在新政治生態學的架構下, 拉圖爾希望科學研究有其角色可以扮演, 而不是被消音, 永遠成為失語症者。對拉圖爾而言, 兼具政治知識論特色的政治生態學不但拒絕人本中心論的核心思想, 也不扮演「思想警察」的角色, 把物件或非人摒棄在社會集體之外。

在《自然政治》中, 拉圖爾重新詮釋柏拉圖的「山洞寓言」: 山洞內的世界為「人」的世界, 沒有物件; 只有影子, 沒有光, 因此沒人能真正看到真理。拉圖爾把哲學家變成「哲學家—科學家」, 讓科學家也能充當「中介」, 透過實驗室的證據, 穿梭於可見性和不可見性的世界。這個

19 可參見史坦葛(Isabelle Stengers)在《世界政治學I》(*Cosmopolitics I*)指出生態學有雙重意義: 科學的和政治的(32)。

「介入」能使山洞中的人走出「黑暗」和「無知的專制」，向真理的道路前進。對拉圖爾來說，山洞中的陰影是「物本身」(things “as they are”)，而科學的角色有助於區分本體論和知識論的內在問題和衝突，有效地中止山洞中的人對真理喋喋不休的爭辯(10-18)。

拉圖爾用科學研究的角度重讀柏拉圖的「山洞寓言」意在繪製一個兩院制的議會，並試圖穿越這個二元對立的幻界世界(13)。在此寓言中，山洞內「人」的世界是上議院，而下議院則是「非人」的外在世界。拉圖爾試著打通兩者之間的壁壘，讓現實的包容性更強：(1)科學和政治可以在新的議會政治扮演更積極的角色，(2)「物的政治」(*Dingpolitik*)渴望可以實現，而且(3)人和非人可以「一起生活」。在此，拉圖爾式的公共空間企圖結合科學研究和(民主)政治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本書的副標題「如何把科學帶進民主」所揭示的一樣。²⁰

拉圖爾的政治生態學也回應生態危機的問題。正如前面所言，生態危機也是物件危機。我們不能將生態或環境問題圍堵在自然世界而不讓這些問題進入新(物的)議會政治來討論。拉圖爾的政治生態學就是要處理生態危機中「不確定性」(uncertainty)問題，而「風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境症候。

根據新任總裁肯尼巴二世(Franklin Kennibar, Jr.)，克萊兒跨國公司的營運最高指導原則為：

要獲利。要持續獲利。最後一定要獲利。要謀生。要製造商品。要用最經濟的方式製造商品。要做大量的商品。要做耐久性的商品。要做最可能持久的商品。要做人們需要的商品。要做人們喜歡的商品。要讓人喜歡商品。要提供有意義的工作。要提供可靠的工作。要提供工作。要工作。要為最多數人提供最好食物。要提倡大眾福利。要提供大眾基本防衛。增加正常股票持有人的價值。要付投資

20 在結論中，拉圖爾明言：政治生態學的要務是要讓「科學研究」和「民主」結合。

人正常股利。要增加公司最大淨值。要增加持股人的利益。成長。進步。擴建。加強專門技能。增加稅收，減低支出。用更便宜的方式完成工作。有效地完成工作。買低賣高。加強人才培訓。創造下一波科技新趨勢。對自然做合理化解釋。改善地景。打破空間，抓緊時間。挖掘人類潛能。聚集老人退休金。累積資本，做想做的事。找出想做的事。未雨綢繆。讓生活簡易一點。讓人更有錢。讓人更快樂。打造更好的明天。有借有還。讓資本流動更順暢。要讓公司繼續下去。要做生意。持續做生意。思考做生意的目的為何。
(56)

儘管克萊兒要和一家菸草公司合併，肯尼巴二世依然要為公司計劃未來，思考各種風險和危機處理的可能性。經過蘿拉事件後，克萊兒公司將萊斯伍鎮的「農產品部門」(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Division)轉賣給孟山多(Monsanto)。蘿拉前夫唐也將房子賣掉、搬家並再娶；兒子提姆用蘿拉的理賠費支助他就讀麻省理工，畢業後則在克萊兒公司做研發工作。女兒艾倫後來進大學讀植物學，婚後不孕做試管，但後來也被檢出卵巢出了問題而無法受孕。

拉圖爾在《法國巴氏殺菌法》(*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的第三章「人類學分析學」(anthropologies)指出，微生物是「晦暗不明」的行動體，透過實驗，微生物終於可以被看到；不但如此，每個行動體皆可用「姿勢」或「症狀」向世界傳遞訊息或再創造另一可能世界(192)。²¹正如鮑爾斯的《獲利》所暗示的，公司不斷製造商品，而且商品有時會釋放有毒的物質，如Astral殺蟲劑，這些有毒副產品或行動體與身體聯結後，身體最後會以「症狀」的方式與社會集合體溝通。蘿拉的癌症就是一例，這可提供貝克(Ulrich Beck)「風險社會」理論的基礎，但拉圖爾則將風險與環境議題做更進一步的聯結，因為風險並不專屬於人。²²

21 在《重組社會》中，拉圖爾和哈門一樣，認為物有「告退性」的特質(56)。

22 當代哲學家和心理分析學者紀傑克認為「風險社會」理論的「風險」一詞是錯誤的命

風險具雜糅性、共伴性和不確定性，且是跨越自然和文化的邊界。為了走出現代性的「排他律」，拉圖爾認為《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提供兩個選項供讀者思考：現代化或生態化？(142-46)。很明顯地，當「我們」都知道「我們」好像都是活在現代社會之中。然而，從拉圖爾對「我們」社會的描述，非人其實是從「我們」的社會中被排除在外。這種將科學、非人、物件排除於政治之外的思考模式，應須重新檢驗和反省。因此，鮑爾斯的《獲利》可讓我們透過新的政治生態學，再度思考人與物／商品、科學和生命政治之間的互動是如何引起「生態疾病」(ecosickness)和存在的不確定性。

五、結論

透過對物件導向理論的重新詮釋，我們知道拉圖爾的「政治生態學」將物件政治化，追求一種新物質的創世觀和存在樣態。異於傳統的物件情性理論，他特別強調物的事件性和可蛻變的未來性。拉圖爾反對「尊重他者」(Respect for the other)之立場，將他者懸置於「代議暴力」(the violence of representation)的人文主義白色神話中。他所主張「物的議會」要求在當代憲政之前，人物主客彼此「平等」，而不是「對等」。這也與比利時科學哲學家史坦葛(Isabelle Stengers)所謂的「世界政治學」(cosmopolitics)理念相近；也就是說，一個行動者和行動體均可納入新的現代議會政治平台中(*Cosmopolitics II* 394-95)。例如，漁夫和魚貨、資本主義／公司／工業和消費者、製造者和商品、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

名(a misnomer)、是一種「被動的」去承認「命運」(108)以及「物化」的多元文化現象(*Conversations* 109)。這也可以從他在《神精質的主體》(*The Ticklish Subject*)一書中看出：風險結合低可能性和高風險所形成的一種「弔詭」現象，它主要是透過評議委員幫我們作選擇；也就是說，風險社會某些情況「基本上是不可能決定的，但我們還是要做出決定」。紀傑克批評風險社會中的主體主要是經由「焦慮的自由去做選擇」，「被迫不斷地作出抉擇」，「斷然不曉得自己這些抉擇的後果」(473)。另外，拉圖爾也批評貝克的風險理論未能涵蓋「非人」的風險問題。

世界(cosmos)和混沌(chaos)等，都是新的社會集合體，提供我們思考物件的潛能及其不能。在此，拉圖爾的物件共和國頗具開放性，他的政治生態學既不「恨世」(misanthropic)，也不壓抑物或物件的政治性。因此，儘管有風險、衝突或威脅，拉圖爾和鮑爾斯的科學研究仍然試著將自然和科學再政治化，希冀改變未來社會的可能性。鮑爾斯說，他的小說《獲利》像是一個〈瞎子摸象〉故事。在故事中，這隻大象就是資本主義，讓我們看到(公司型的)資本主義在發展時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經由科學研究的方法來描述克萊兒化學公司的歷史發展和各類物件的研發說明，以及蘿菈的癌症治療過程，鮑爾斯在《獲利》中，不但考量作為人與非人之間的跨身體性關係，也鼓勵我們思考物件的政治性以及倫理學。它們是物，它們是行動體，它們能創造自己的互物性網絡以及因彼此碰撞所引發的倫理議題，故其存在特色應被敘述出來。

引用書目

- 康德(Kant, Immanuel)。《純粹理性批判》*Chuncui lixing pia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譯：鄧曉芒[Trans. Xiao-Mang Deng]。台北：聯經[Taipei: Linking]，2004。
- Alaimo, Stacy.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10.
- . “Dispersing Disaster: The Deepwater Horizon, Ocean Conservation, and the Immateriality of Aliens.” *American Environments: Climate-Cultures-Catastrophe*. Ed. Christof Mauch and Sylvia Mayer. Heideleg: Universitätsverlag, 2012.
- . “States of Suspension: Trans-corporeality at Sea.” *ISLE* 19.3 (2012): 476-93. [http://dx.doi.org/10.1093/isle/iss068]
- . *Expose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leasures in Posthuman Time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6.
- Barad, Karen.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3 (2003) 801-31. [http://dx.doi.org/10.1086/345321]
- .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Durham: Duke UP, 2007. [http://dx.doi.org/10.1215/

9780822388128-002]

Blok, Anders, and T. E. Jensen. *Bruno Latour: Hybrid Thoughts in a Hybri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11.

Burn, Stephen J., and Peter Dempsey, eds. *Intersections: Essays on Richard Powers*. Champaign: Dalkey Archive P, 2008.

Colebrook, Claire. “Who Comes After the Post-human?” *Deleuze and the Non/Human*. Ed. Jon Roffe and Hannah Stark. New York: Macmillan, 2015. 217-33. [http://dx.doi.org/10.1057/9781137453693_13]

Dewey, Joseph. *Understanding Richard Powers*.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2.

Guattari, Felix. *The Three Ecologies*. Trans. Ian Pindar and Paul Sutt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0.

Harman, Graham. “The Importance of Bruno Latour for Philosophy.” *Cultural Studies Review* 13.1 (2007): 31-49.

———.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Political*. London: Pluto, 2016.

Heidegger, Mart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Houser, Heather. *Ecosickness in Contemporary U.S. Fiction: Environment and Affect*.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4. [http://dx.doi.org/10.7312/hous16514-002]

Hume, Kathryn. “Moral Problematics in the Novels of Richard Powers.” *Critique* 54 (2012): 1-17.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 Smith. Oxford: Oxford UP, 1929.

Knappett, Carl, and Lambros Malafouris, eds. *Material Agency: Towards a Non-Anthropocentric Approach*. New York: Spinger, 2008. [http://dx.doi.org/10.1007/978-0-387-74711-8]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P, 2005.

———.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04.

———. “From Realpolitik to Dingpolitik, or How to Make Things Public.” *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 Ed. Bruno Latour and Peter Weibel. Cambridge: MIT P, 2005. 19-32.

———.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 1999.
- . “On Interobjectivity.” *Mind, Culture, and Activity* 3.4 (1996): 228-45. [http://dx.doi.org/10.1207/s15327884mca0304_2]
- . “On Actor-Network Theory.” *Soziale Welt* 47 (1996): 369-81.
- . “Do Scientific Objects Have a History?” *Common Knowledge* 5.1 (1996): 76-91.
- . “Powers of the Facsimile: A Turning Test o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Burn and Dempsey* 263-91.
- .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3.
- .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8.
- .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7.
- .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1986.
- Mackay, Robin, ed. *Collap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 3. Falmouth: Urbanomic, 2007.
- Maliszewski, Paul. “The Business of Gain.” *Intersections: Essays on Richard Powers*. Burn and Dempsey 162-86.
- McGee, Kyle. *Bruno Latour: The Normativity of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 2014.
- Mermin, David. “Is the Moon There When Nobody Looks?: Reality and the Quantum Theory.” *Physics Today* 38.4 (1995): 38-47. [<http://dx.doi.org/10.1063/1.880968>]
- Moretti, Franco.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 Morton, Timothy. *Hyperobject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3.
- Nixon, Rob.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11. [<http://dx.doi.org/10.4159/harvard.9780674061194>]
- Plumwood, Val. *Environment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 Powers, Richard. *Gain*. New York: Picador, 1998.
- Puig de la Bellacasa, Maria. “Matters of Care in Technoscience: Assembling Neglected Thing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1.1 (2011): 85-106. [<http://dx.doi.org/10.1177/0306312710380301>]
- Stengers, Isabelle. *Cosmopolitics I*.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0.
- . *Cosmopolitics II*.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1.
- Sun, Jian. “Fictional Collision: Richard Powers on Hybrid Narrative and the Art of Stereoscopic Storytelling.” *Critique* 54 (2013): 335-45. [<http://dx.doi.org/10.1080/0011161>]

9.2013.783547]

White, Lynn,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 (1967): 1203-07.

Williams, Jeffrey J. "The Last Generalist: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owers." *Minnesota Review* 52-54 (2001): 95-114.